

国外社会化媒体与抗争行动研究述评

——以英美及中东地区为考察中心

罗 东

[摘要] 社会化媒体被称为是互联网的一次信息技术革命。近年来,它对抗争政治所产生的显著影响、功能吸引了国外学者的学术旨趣,相关的研究也不断涌现。这些研究回答了两者关系的基本逻辑与内容。尽管现有的这些研究是多学科的、多路径的、多方法的,但缺乏学科间的理论交流与相互借鉴。本文从“行动逻辑”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梳理了来自国外(英美、中东等)的研究成果,指出国外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成果和不足,并提出超越“单向度文本”、“技术决定论”、“技术限制论”等困境的可能出路,同时为中国语境下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 社会化媒体; 抗争行动; 抗争政治; 行动逻辑;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C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633(2015)04-148-8

当下,诞生于互联网2.0时代的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①仍是一项方兴未艾的网络信息技术,如twitter和facebook,以及国内的新浪微博(weibo)等。它们正在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社会”产生广泛又深刻的影响,因而被学术界称为是互联网媒体的一次全新革命。

相较于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打破了作者与受众的传统界限,编辑权(right to edit)的垄断地位被让渡给普通大众,信息传播由单线变革为双线。人们可自由编写和参与评论、转发信息文本,言语行动(action of saying)在网络技术上也变得可能。在西方的一些学者看来,社会化媒体的这些传播特征能够调动起参与公共的艺术(participatory public

art)⁽¹⁾,这是因为社会化媒体在政治风格上更为激进,必然地同抗争行动(contentious actions)紧密相关。⁽²⁾在英美和中东地区,从“以人为本”(Put People First)、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到伦敦骚乱,再到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等运动,社会化媒体一次又一次地被行动者(actors)征用,基于此而开创了抗争行动在社会化媒体之下的政治实践。

鉴于此,本文在结构上首先是回顾“作为动员结构的社会化媒体”,这既是对“抗争政治”这一话语中的社会化媒体的定位,也是对其行动逻辑的分析和认识。接下来,是对研究方法的回顾和评论。如何来收集和分析资料,不同知识背景的研究

① 有的研究者译之为“社会媒体”或“社交媒体”,同时也有研究者称之为“社交网络”(social networking)或“新媒体”(new media),不一而论。但从跨学科的角度来讲,又特别是考虑到它产生的政治与社会意义,这里以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来称呼它似为更妥,一则避免了“新媒体”等概念的时效性,二则也在于,以“化”字反映了它建构政治与社会的过程。

[收稿日期] 2015-02-04

[作者简介] 罗东,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方向:集体行动、城市问题与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湖北武汉 430072

有着不同的方法，它不仅是多元的，实则也是受技术限制的。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将找出现有国外研究在帕森斯意义上的“剩余范畴”（residual categories）⁽³⁾，提出超越“单向度文本”、“学科沟壑”、“技术限制论”、“技术决定论”等理论困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指出它们对于理解中国语境下相关研究的借鉴意义。

一、行动的逻辑：作为行动结构的社会化媒体

根据 Latour 提出的“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ing）模型，Bennett 等人把数字化的网络运行机制视为在连结网络中的潜在“中介”（agent），认为其可以更清晰地阐释由人与社会化媒体技术构成的组织结构。⁽⁴⁾在他们看来，“这种数字化机制包含了以下一些工具：组织化的连接者（如网址链接），行动协调者（如抗议活动的日程表），信息的共享以及‘内嵌’式的多功能平台（如 twitter 或 facebook 中的帖子所包含的链接），等等。这些技术手段不仅提供了线上的会议平台，还协调了线下的活动”⁽⁵⁾。社会化媒体不仅是一种信息流通机制，还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双重作用构成了抗争政治中的行动结构。这种结构不仅有别于传统的抗争手段、资源，且同以往的互联网手法也有较大的差异。作为当下新兴的媒体，社会化媒体既是信息流动的平台，同时也是一种网络组织或者说行动结构。这也是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路径的一个学理因素。

笔者将梳理如下。

（一）社会化媒体是一种信息流

在较早的研究中，Etzioni 等学者坚持认为，互联网无法提供面对面（face-to-face）的交流，因而对抗争政治的影响将是暂时的而不是持久的。⁽⁶⁾但后来的实践却证明，他们低估了网络在信息生产和传播方面的强大能力。行动者对社会化媒体的征用，首先得益于在信息生产、传播方面的技术优势，这应了 McLuhan 那一句经典的论断“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在传播技术上，社会化媒体使那些在传统媒体（包括将退出互联网舞台的 BBS 等网络平台）不能被接受或不能实现有效传播的抗争文本成为了可能。当下的社会化媒体已经深刻地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存在大量的潜在的、可能的受众。在具体的研究中，Amin 就认为，正是因为 twitter 等社会化媒体，有关伊朗绿色运动（Iran's Green Movement）的消

息才能迅速传播开来。⁽⁷⁾事实上，社会化媒体提供的行动信息不仅有文字或图片，还可以有视频。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后，twitter 和 youtube^① 的相关视频构成了运动中利益表达的重要交流资源，正是这些视频把信息传播给了更大范围的行动者。⁽⁸⁾

研究还发现，在行动的实践中，行动者建构出了一套信息逻辑结构，包括：（1）符号与文本框架。文字是抗争文本的基本形式，有关行动的基础信息首先是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如何建构这些文字，是吸纳更多支持者或行动者的一个条件（也是手段），因而技巧性地利用文字表达，便是抗争的一项重要策略。从研究成果来看，这些技巧有：标点符号的使用策略，比如对“！”、“！！”等符合的技巧性使用。此外，行动者还往往偏爱那些“精悍的文本评论”（brief textual comments），态度鲜明、表达简明。⁽⁹⁾（2）多样化的抗争文本。除了文字外，行动者还广泛地使用视频、音乐等作为抗争文本。图文并茂、声像兼有的抗争文本带有更为强烈的感染力。⁽¹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出现在 twitter、youtube 等上面的音乐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动员作用。⁽¹¹⁾同时，信息中的情绪也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当这种情绪一旦以文字、图片或视频呈现出来，反过来，它自身便也构成了一种文本。⁽¹²⁾人们被这种情绪所吸引、所感染，以此促成了行动的生成。（4）邀请关键人物。尽管有观点认为，社会化媒体的阅读逻辑是缺乏信息级联（information cascades）的，⁽¹³⁾但更多的研究依然发现了这些重要人物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信息流结构中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hip）这一角色。Reicher 在对伦敦骚乱的研究中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发现，有影响力的人往往更能推动信息的扩散，也能吸引更多的参与者。⁽¹⁴⁾有观点甚至认为，是意见领袖，而不是社会化媒体自身在促进和引领公民的政治参与。⁽¹⁵⁾也正是如此，比如在 twitter，行动者总是会以“@”加“关键人物”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行动者或舆论关注。

据此，有研究把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的社会化媒体定位为“数字（信息）的传道者”（digital evangelists）、“技术—现实主义者”（techno-realists）。⁽¹⁶⁾社会化媒体的确提供了强大的信息流。这些信息是可编辑的，因而也是动态的，可以不断地推动抗争话语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人们并非是无条件地受到信息流的影响，对信息的接受、认同照样构成了选择的可能条件。人们会跳过那些在他们

① twitter 上的视频是以网址链接的形式嵌入，youtube 则可直接上传视频，但也兼有转发、链接等形式。

看来是无关紧要的、自身无法认同的信息。⁽¹⁷⁾

(二) 社会化媒体是资源动员理论在当下的一次实践

资源动员理论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强调抗争行动或抗争政治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工具性资源,如媒介、资金或时间等。⁽¹⁸⁾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媒体被认为是资源动员的一项重要资源。⁽¹⁹⁾

当下,社会化媒体则是资源动员理论的又一次实践,是行动者可被征用的平台资源。Ortiz 等人就指出,社会化媒体是一种虚拟的动员结构 (virtual mobilizing structure),将“个体的公民参与” (individual civic engagement) 转化为“公民的集体行动”,在这一过程之中,人们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来分享对行动事件的关注。⁽²⁰⁾ 那些走上大街的抗争政治之所以能够发生,或者说,之所以可以更大规模的发生,正是因为社会化媒体在发挥作用。尽管导致抗争行动发生的或者致使抗争政治可能的因素往往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多样性的,但不论如何,行动意识出现后将有一个从行动意识向行动实践转变的过程。社会化媒体使行动前的宣传低成本化、便捷化,可以动员潜在的支持者或行动者,同时在线的交流等互动也可为行动提供“商计”的机遇。^{(21) (22)}

(三) 社会化媒体提供社会资本 “强连结”与“弱连结”之辩

通常而言,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即可提供各类社会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抗争行动来说,它是促成行动者联合起来的一个条件。⁽²³⁾ 这在于:一方面,行动者可通过个人社会资本拉拢或团结更多的潜在行动者,另一方面在于,社会资本可在行动中建立起来,以保证抗争行动能够维持下去。

但这种社会资本基于什么样的结构逻辑,西方学术界持不同的意见。笔者把他们概括为“强连

结”与“弱连结”之辩。

弱连结: 在社会化媒体诞生之初, Lim 认为这种在线抗争的结构是“弱”的人际联系。⁽²⁴⁾ Bennett 和 Segerberg 两人的综合性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区分了集体行动 (collective action) 与连接行动 (connective action),认为发生在社会化媒体语境中的行动不再具有以往的集体性特征,而不过是一种连接性的。前者高度组织化且每个行动者都有着集体身份,后者则仅是建立在网络共享中,是极弱的一种人与人关系。这种网络模式下,政治上的诉求仍然通过个人化的方式来表达和分享,只不过是借用了社会化媒体来迅速传播,^{(25) (26)} 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仅停于网络交流,缺乏组织性,也缺乏延伸到线下的可能。

强连接: 但在 Ganesh 和 Stohl 的研究中,组织化在数字化时代仍然是存在的。⁽²⁷⁾ 他们通过分析美国各大城市的占领运动 (the Occupy Movement),提出了“后西雅图” (post - Seattle) 抗议模式,认为制度逻辑 (institutional logic) 依然是抗议中的动力,这些逻辑包括了集体行动、连接行动、聚集行动 (aggregation) 等,即行动者是存在组织或制度的,而并非是一种涣散关系。此外,还有的研究把行动者之间的在线关系表述为“蚁群” (ant colony),他们认为,每一个行动者类似于一只蚁,找信息线索时分头行动,但根据这些线索又能很快地聚集在一起,存在明确的组织化分工。⁽²⁸⁾ 这种关系并不弱。

如果仅从行动的表征来看,我们仍然无法在一个确切的意义上认定基于社会化媒体的行动者之间到底是“强连结”还是“弱连结”。社会化媒体在抗争中不断实践,也不断产出新的行动逻辑。笔者认为,如果抛开特定的案例,从整个宏观结构中来把握其中的社会资本,就会看到“强”与“弱”两者之间的共存与张力。它们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① 这方面的研究例子: 在沙特阿拉伯的女性驾驶权利 (Right - to - Drive) 运动中, Agarwal 等人给我们展示了行动者是如何通过社会化媒体动员了更多的行动者。他们认为, Al - Huwaidar (沙特阿拉伯的一名女权主义行动者) 在 youtube 上发布的视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社会化媒体的出场,这次行动或许并不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参见 Agarwal, Nitin, Merlyna Lim & Rolf T. Wigand.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Meets the Blogosphere: A New Methodology” [C]. In S. Fong et al. (Eds.). Networked Digital Technologies: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1, 136: 224 - 239 和 Yuce, Serpil, Nitin Agarwal and Rolf T. Wigand. “Mapping Cyber -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Female Muslim Bloggers for the Women to Drive Movement” [C]. In A. M. Greenberg, W. G. Kennedy & N. D. Bos (Eds.): Social Computing, Behavioral - Cultural Modeling and Prediction: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Berlin: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3: 331 - 340.

参加对于西班牙的愤怒人群如何走上街头, Castañeda 认为,是这次行动中的领先人群通过 twitter 等社会化媒体以“A Real Democracy Now”来召集人群。参见 Castañeda, Ernesto. “The Indignados of Spain: A Precedent to Occupy Wall Street” [J].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013, 11 (06): 309 - 319. 相对于以往的传播媒介,社会化媒体的资源成本更低、传播效率更高。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资源的社会化媒体被行动者征用,以此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并加强彼此的联系,这才使得行动的大规模进行成为可能。

而是基于抗争目标、对象等类别的不同而存在具体的差异。至于“弱连结”会不会是未来行动的方向，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

(四) 社会化媒体构建起政治的公共空间

有学者这样来形容社会化媒体: The network is global while events are local.⁽²⁹⁾ 笔者将之译为“事虽有域,网则无边”。他们认为,社会化媒体能够通过多种途径把人们的注意力迅速地聚集在一起,打破地域的限制,建构起有别于传统的且放大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整合了线上的虚拟空间和线下的地理空间(geographical space)。在分析twitter、facebook在2011年北非抗议中的角色与功能之时,Rennick把行动过程分为了两个阶段:前动员阶段(pre-mobilization phase)和集体行动阶段(collective action phase)。在前动员阶段,人们把这些社会化媒体作为公共空间,并在行动中不断开发空间——通过分享愤怒等情感来建构共鸣框架——以此来吸引那些可能加入的非政治行动者(non-political actor)⁽³⁰⁾。

社会化媒体为何能、又是如何建构起公共空间的,同传播的信息性质分不开。相对于传统媒体,在信息的生产 and 传播方面,社会化媒体更能契合运动的内容和基调。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初期过程中,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消极态度,社会化媒体更倾向表达和传播积极的、赞扬的以及肯定的态度,认为运动是充满生机的(vibrant)⁽³¹⁾。这种认同让行动者找到了归属感,更容易使他们聚集到twitter、facebook等这样的社会化媒体中来。社会化媒体强化了他们之间的认同。这些有关不公平、或受压迫的认同是抗争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不可忽视的动力源泉。⁽³²⁾

二、方法、技术及其限制

社会化媒体的运行平台是文本的,也是数字的。这既给社会科学的数字化研究带来了便利,但也提出了技术上的挑战。⁽³³⁾

有关方法论上的探讨,有的观点认为可以充分发挥传统研究方法(问卷调查、访谈、实验等)的优势,也有的认为数字平台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因而也需要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³⁴⁾ 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局面。大

致如下几种。

(一) 大数据(big data)研究

大数据不依附于从总体中抽样。社会化媒体的平台技术使“普查”成为了可能,这可能给定量研究带来一场意料之外的变革。在确定事件对象后,通过关键词检索或后台数据提取,可以获得大数据的总体性数据。在这类研究方法那里,省去了抽样、推论等,甚至还可能省去因果推断,而只关注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有研究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比如利用twitter平台对英格兰骚乱的分析,⁽³⁵⁾以及骚乱过程中,警方、社会组织及社会个人是如何使用twitter来应对或回应骚乱的。⁽³⁶⁾①可以预测,这将是未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增长点。

(二) 内容分析

内容分析是大多数研究者的选择。分析工具包括文字的修饰、词性、词频,以及对声像的选用等。Tonkin等学者便选择了内容分析法来研究伦敦骚乱,以“londonriot”、“riotcleanup”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和收集。他们编码的内容包括tweets^②和retweets的文本结构,如名词、形容词的使用,以及发布者(或转发者)的地理位置等信息。⁽³⁷⁾但同时,他们也发现事后的资料(twitter文本)是受到技术限制的,比如运营商的服务器超载(server load)就可能致使收集的范围并不能完全覆盖总体。Shirazi在非洲动乱和运动中,以来自博客、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会化媒体的波斯语(Farsi)和阿拉伯语(Arabic)3635个信息数据为例进行了内容分析。内容分析有文字的,也有视频的。⁽³⁸⁾其中,他们以1100个视频为例,分析了它们的类型、风格、内容来源及质量(production quality)来呈现行动者的话语逻辑。

(三) 个案研究

这里的个案并不是指一项行动事件,更确切地说,是将行动的特定行动者作为分析对象,以呈现出一个行动者的行动全景。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观察到个体是如何策略性地行动,还能观察到他(她)同其它行动者、支持者、抗争对象以及整个外部环境是如何互动的。因此,它也被有的研究采用。Agarwal等人在研究沙特阿拉伯的驾驶权利的文章中,就围绕女权运动者Al-Huwaider为中心,以此为一个案例来分析她发布的youtube视

① 这方面的尝试还包括但不限于: 华盛顿大学信息系对研究阿拉伯之春运动的研究,使用了超过三百万条twitter上的tweets,千兆字节(gigabytes)的youtube视频,以及上千条博客日志(blog posts)。来源: 美国华盛顿大学学术新闻网 <http://www.washington.edu/news/2011/09/12/new-study-quantifies-use-of-social-media-in-arab-spring>, 访问时间: 2013-11-14)。

② 指用户在twitter上发布的内容,通常被翻译为“推文”。同理,retweet则是指转发的推文。

频。⁽³⁹⁾〔40〕但这样的个案研究也有不足，或者说存在一个限定性的条件，那就是分析的个案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或特殊性。这也是采用个案研究较少的原因。恐怕正是如此，他们又通过收集300位个人博客（使用英语书写的穆斯林女性）再次分析了此次运动。⁽⁴¹⁾

（四）田野观察

前面的这三种常见研究方法，都是基于线上而进行的，即研究资料来自于作为平台的社会化媒体。但抗争政治的实践发生于线下，线上与线下并不是断然分开的。⁽⁴²⁾有学者通过在行动现场的（参与式或非参与式）田野观察发现，即使是在行动的进行过程中，社会化媒体也从未远离现场，行动者通过手机APP或WEB实时发布抗争消息，线上与线下是一个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这方面的探索有Ganesh和Stohl两人通过参与式的观察和76份访谈，对美国各大城市占领运动的分析，⁽⁴³⁾以及Castañeda在巴塞罗纳以非参与式的方法对西班牙“愤怒的人群”抗议运动的过程呈现。⁽⁴⁴⁾

此，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不仅是个人偏好或路径依赖的问题，也是一个基于资源与效率的平衡过程，这是因为，这些方法在技术性难度、成本与解释力之间存在一对张力，见图1。尽管如此，Reicher等人还是坚持认为，除了深入的实证研究（in-depth empirical study）外，别无他法来能够呈现行动的完整面貌。⁽⁴⁶⁾

三、结论与超越：可能的研究走向

社会化媒体是否在影响抗争行动，它们的角色如何，两者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在西方的研究中，有的学者对此持怀疑或不确定的态度。⁽⁴⁷⁾但更多的研究则支持了这样的论断：社会化媒体在抗争行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功能，不仅于此，还建构出了新的行动逻辑，包括（1）社会化媒体是新的信息流，为行动者提供即时的行动信息；（2）社会化媒体是资源动员理论的一次实践，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介资源，它使得大街上的行动成为了可能；（3）社会化媒体提供行动的社会资本，尽管西方学术界对此存在“弱连接”与“强链接”的分歧，但它建构或重建了行动中的社会资本；（4）社会化媒体建构起政治的公共空间，相较于传统媒体，它更能包容行动的对抗性，等等。

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方面，他们大多以案例分析、内容分析、实证（大）数据、参与或非参与式观察等方法为主。这既呈现了方法论的多元化，但事实上，又是受技术限制的。

应该说，目前国外的研究回答了当下社会化媒体与抗争行动的基本问题。但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于两者的逻辑结构仍显模糊，在方法方面也稍显吃力。笔者认为，对于社会化媒体与抗争政治两者的研究，要走出“技术决定论”，既要认识到社会化媒体给抗争政治提供的技术支持、政治机遇，但又要认识到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回到线下的实体政治中。技术无法解决根源，原因在于：（1）社会化媒体的出现，在技术上使这样一些抗争成为可能，以低成本、便捷的形式运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替代线下或传统的组织结构；（2）对于英美国家来说，这些大量的抗争行动，尽管一方面表明了国家对抗争力量与运动制度化能力，但同时，具体的抗争条件仍根源于社会问题，特别是长期难以缓解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愈加显著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失业等尖锐矛盾。同时，也要走出“技术限制论”，对于研究者而言，目前的研究方法固然受到了技术的一些限制，但可以通过多元化的方法以及多学科的相互借鉴（或合作）来走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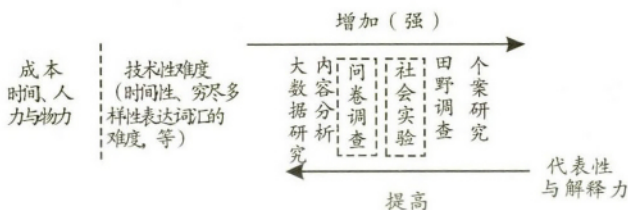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研究方法的优势与劣势比较

说明：带虚线框的为较少使用（问卷调查）或将来可能使用（社会实验）的研究方法，这里不作分析。

但事实上，早在2011年的英格兰骚乱发生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普遍因技术受限，在方法上感受到了挑战。除了宏大数据的收集成本等限制因素之外，研究人力成本也是一个问题。笔者在回顾这些研究中发现，涉及到具体资料收集和分析的，很少有学者单独完成的。社会化媒体在时间问题上也是受限的。在对非洲动乱和运动的研究中，Shirazi承认，资料的时间受限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遗憾。⁽⁴⁵⁾正是如此，研究者无法把握运动发生在社会化媒体前后的逻辑联系，只能在既定的材料中挖掘出相应的信息。首先是因为社会化媒体自身便是一个新兴产品，有它的时间性，无法在技术上往回追；其次，在一次运动或抗争中，社会化媒体也绝非资源媒介的全部内容。此外，社会化媒体用户使用语言的多元性也是资料收集的一个难题，人们对事物的表达用语是存在差异的，以某个某些词汇作为关键词来搜索并不能保证涵盖了既定的总体。正因如

这种限制——事实上也走出了“学科沟壑”困境。面对社会化媒体框架之下抗争行动机制，如果学术界怯于技术的困境或限于传统的研究方法（或单一学科），都不利于探索这一次网络信息技术大变革为政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

除此之外，本文还认为，目前的研究还有未涉及到或研究不充分的领域，也即帕森斯意义的“剩余范畴”——同时，也是未来的可能走向：（1）走出“单向度文本”：对抗争对象的研究。目前来看，还缺乏对抗争行动对象的研究，如政府、银行或其它类型的公共部门或利益集团，而是局限于“单向度文本”。国家是影响（社会）抗争的根源，也是其重要变量。^{〔48〕}事实上，在这股社会化媒体的浪潮中，被吸引的不仅是作为个体的公民、NGO，还有国家的公共部门。在英国，政府部门（特别是警察）已在使用包括 twitter 等 Web2.0 产品。^{〔49〕}美国联邦政府也是如此，他们还主动以可能的方式争取人们的政治参与。^{〔50〕}相反，来自中国的不少研究经验则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政府在抗争政治中的行为与逻辑。（2）对搭便车（free riding）行为的研究。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这是集体行动中一个亘古尤新的困境。^{〔51〕}社会化媒体固然方便了人们的行动，通过对抗争内容的评论或转发，都可以支持行动的进程。但反过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现实行动，认为只需要评论或转发就可以省去线下的实践了，成为只言说而不缺乏行动的人，搭便车的伦理困境降低，搭便车的可能性将更大。（3）对行动出现与演变的预测。根据对社会化媒体的信息观察，特别是当一件突发事件爆发之时，对人们的线上言语行动和线下实际行动的可能性作出判断和预测，可以及早发现问

题、解决病症。但目前的研究还较为缺乏预测和建模的能力。^{〔52〕}

回到中国，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在 2013 年以来进入了“倦怠期”，研究的高产期（2011—2013）已经过去。^{〔53〕}同时，即使是在研究兴盛时期，有关社会化媒体与抗争行动的研究也甚少，更无建构出统一的理论模型的迹象。在笔者看来，限制这一研究现状的因素至少涉及到：（1）除新闻学、传播学、市场营销等学科外，对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基础学科来说，社会化媒体仍然还是一个新生事物；（2）中国语境下，有关诉求或抗争的行动首先面临合法性的困境，以集体形式来表达抗争的可能性很小，而是以个体维权为主；（3）纵然是民工、出租车司机等群体为争取权益而组织起集体行动，受知识构成等限制，也较少使用到社会化媒体，但从近年南方沿海城市的民工抗争，这种情况已在发生变化；（4）社会化媒体技术在不断演变与升级中，导致相关的学术话语的前后变化乃至不一致。但尽管如此，不仅社会化媒体作为行动结构在影响（个体或集体）抗争的事实仍然存在，在将来还有扩大的趋势。现有的研究并不充分，相反，大众媒体的报道、分析却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但深入的、确切的研究仍旧依靠学术研究来完成。相较于国外（英美、中东等）的研究经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国内还尚未充分使用内容分析、田野观察以及大数据研究等多种的方法。这是可以向国外研究借鉴的方面。同时，我们还较为缺乏来自政治学、社会学等基础社会科学对该议题的专业回应。此外，我们也理应主动识别出国外研究的不足，诸如对政府方面关注不足、学科交叉和理论交流缺乏等，并以此来审视自身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Harrison, Teresa & Brea Barthel. "Wielding New Media in Web 2. 0: Exploring the History of Engagement with the Collaborative Construction of Media Products" [J]. *New Media & Society*. 2009, 11 (06): 155 - 178.
- 〔2〕〔38〕〔45〕 Shirazi, Farid. "Social Media and th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People*. 2013, 26 (1): 28 - 49.
- 〔3〕 Parsons, T.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17.
- 〔4〕 Segerberg, Alexandra & W. Lance Bennett. "Social Medi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Using Twitter to Explore the Ecologies of Two Climate Change Protests" [J]. *Communication Review*. 2011, 14 (3): 197 - 215.
- 〔5〕〔26〕〔42〕 Bennett, W. Lance & Alexandra Segerberg.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Information" [J],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 (06): 739 - 768.
- 〔6〕〔22〕〔40〕 Agarwal, Nitin, Merlyna Lim & Rolf T. Wigand. *Web 2. 0 Technologies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New York. 2012: 99 - 123.
- 〔7〕 Amin, Ansari.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Iran's Green Movement (2009 - 2012)" [J]. *Global Media Journal: Australian Edition*. 2012, 6 (2): 1 - 6.

- [8] [11] Thorson, Kjerstin, Kevin Driscoll, Brian Ekdale, Stephanie Edgerly, Liana Gamber Thompson, Andrew Schrock, Lana Swartz, Emily K. Vraga & Chris Wells. "Youtube, Twitter and the Occupy Movement: Connecting Content and Circulationpractices" [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3, 16 (3): 421 - 451.
- [9] Tonkin, Emma, Heather D. Pfeiffer and Greg Tourte. "Twitte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London Riots?" [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38 (2): 49 - 57.
- [10] [53] 罗东. "性话语"是弱者的又一件武器: 中国微博语境下的抗争表达与诉求研究 [J].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 2013, 秋冬号: 33 - 67.
- [12] [41] Yuce, Serpil, Nitin Agarwal and Rolf T. Wigand. "Mapping Cyber - Collective Action among Female Muslim Bloggers for the Women to Drive Movement" [C]. In A. M. Greenberg, W. G. Kennedy & N. D. Bos (Eds.): *Social Computing, Behavioral - Cultural Modeling and Prediction: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Berlin: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3: 331 - 340.
- [13] Hong, Sounman. "Online news on Twitter: Newspapers' Social Media Adoption and Their Online Readership" [J].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2012, 24 (06): 69 - 74.
- [14] [46] Reicher, Stephen. "Reading the Riot Actors" [J]. *New Scientist*. 2011, 211 (06): 30 - 31.
- [15] Park, Chang Sup. "Does Twitter Motivate Involvement in Politics? Tweeting, Opinion Leadership,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29 (06): 1641 - 1648.
- [16] Comunello, Francesca & Giuseppe Anzera. "Will the Revolution be Tweete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Social Media and the Arab Spring" [J]. *Islam and Christian - Muslim Relations*. 2012, 23 (06): 453 - 470.
- [17] Schumann, Sandy, Olivier Klein & Karen Douglas. "Talk to Act: How Internet Use Empowers Users to Participate in Collective Actions Offline" [C]. In M. Bang & E. L. Ragnemalm (Eds.). *Persuasive Technology. Design for Health and Safety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Berlin: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2012: 79 - 89.
- [18] Jenkins, J. C.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83, 91 (01): 527 - 553.
- [19] 赵鼎新. 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 [J], *社会学研究*, 2006, (1).
- [20] Ortiz, David G. & Stephen F. Ostertag. "Katrina Blogg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Civic Action: The Web as a Virtual Mobilizing Structure" [J].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2014, 57 (01): 52 - 78.
- [21] Lim, Merlyna. "Clicks, Cabs, and Coffee Houses: Social Media and Oppositional Movements in Egypt (2004 - 2011)"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2, 62 (2): 231 - 248.
- [23] Sturtevant, Victoria. "Reciprocity of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ctive Action" [J]. *Community Development*. 2006, 37 (01): 52 - 64.
- [24] Lim, Merlyna. "Global Muslim Blogosphere: Mosaics of Global - Local Discourses" [C]. In M. McLelland & G. Goggin (Eds.).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et Studies: Beyond Anglophone Paradigms*. London: Routledge. 2009: 178 - 195.
- [25] Segerberg, Alexandra & W. Lance Bennett. "Social Medi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Using Twitter to Explore the Ecologies of Two Climate Change Protests" [J]. *Communication Review*. 2011, 14 (3): 197 - 215.
- [27] Ganesh, Shiv & Cynthia Stohl. "From Wall Street to Wellington: Protests in an Era of Digital Ubiquity" [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013, 80 (06): 425 - 451.
- [28] Banerjee, Soumya & Nitin Agarwal. "Analyzing Collective Behavior from Blogs Using Swarm Intelligence" [J].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2012, 33 (06): 523 - 547.
- [29] Pereira, Gilberto Corso, Maria Célia Furtado Rocha & Alenka Poplin. "E - Participation: Social Media and the Public Space" [J].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2012, 7333 (1): 491 - 501.
- [30] Rennick, SarahAnne. "Personal Grievance Sharing, Frame Alignment, and Hybrid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s: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North Africa's 2011 Uprisings"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2013, 31 (06): 156 - 174.
- [31] DeLuca, Kevin M., Sean Lawson & Ye Sun. "Occupy Wall Street on the Public Screens of Social Media: The Many Framings of the Birth of a Protest Movement" [J].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2012, 5: 483 - 509.
- [32] Zomeran, Martijn Van, Tom Postmes, Russell Spears, Karim Bettache. "Can Moral Convictions Motivate the Advantaged to Challenge Social Inequality? Extending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J].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 tions. 2011 , 14 (06) : 735 - 753.
- (33) Duttona , William H. “The Social Shaping of Digital Research”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2013 , 16 (03) : 177 - 195.
- (34) Edwardsa , Adam , William Housleya , Matthew Williamsa , Luke Sloana & Malcolm Williamsa. “Digital Social Research , Social Media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Surrogacy , Augmentation and Re - orient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 2013 , 16 (03) : 245 - 260.
- (35) Proctera , Rob , Farida Visb & Alex Voss. “Reading the Riots on Twitter: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Big Dat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2013 , 16 (03) : 197 - 214.
- (36) Procter , Rob , Jeremy Crump , Susanne Karstedt , Alex Voss & Marta Cantijoch. “Reading the Riots: What were the Police doing on Twitter?” [J]. Policing and Society. 2013 , 23 (06) : 413 - 436.
- (37) Tonkin , Emma , Heather D. Pfeiffer and Greg Tourte. “Twitter ,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London Riots?” [J].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 38 (2) : 49 - 57.
- (39) [52] Agarwal , Nitin , Merlyna Lim & Rolf T. Wigand.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Meets the Blogosphere: A New Methodology” (C). In S. Fong et al. (Eds.) . Networked Digital Technologies: Communications in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1 , 136: 224 - 239.
- (43) Ganesh , Shiv & Cynthia Stohl. “From Wall Street to Wellington: Protests in an Era of Digital Ubiquity” [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013 , 80 (06) : 425 - 451.
- (44) Castañeda , Ernesto. “The Indignados of Spain: A Precedent to Occupy Wall Street” [J].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2013 , 11 (06) : 309 - 319.
- (47) Olorunnisola , Anthony A. & Brandie L. Martin. “Influences of Media on Social Movements: Problematizing Hyperbolic Inferences about Impacts” [J].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2012 , 30: 275 - 288.
- (48) Nette , J. P. “The State as a Conceptual Variable” [J]. World Politics. 1968 , 20 (4) : 559 - 592.
- (49) Crump , Jeremy. “What Are the Police Doing on Twitter? Social Media , the Police and the Public” [J]. Policy & Internet. 2011 , 3 (04) : 1 - 27.
- (50) Wigand , F. Dianne Lux. “Tweets and Retweets: Twitter Takes Wing in Government” [J]. Information Polity. 2011 , 16 (03) : 215 - 224.
- (51) Olson M.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5 - 15.

(责任编辑: 谢莲碧)